

# 海外文献与清代中叶的中西关系史研究

## ——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中文档案之价值<sup>\*</sup>

吴义雄

【摘 要】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之中文档案保存在英国外交部档案中（编号为 F. O. 1048）。这批档案共 1232 件，除 1 件为乾隆年间文献外，其他全部为嘉庆七年（1802）至道光十四年（1834）的文件。这些新史料可与已刊中文文献如《清代外交史料》、《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达衷集》等互补，可与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等英文文献互证。更多的新史料可提供学界迄今所未了解的历史信息，研究者可据以研究多方面的重要问题，包括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各种制度等，从而更全面、更透彻地认识清代中叶的中西关系史。

【关键词】英商馆中文档案 已刊中文文献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行商 中西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8）03-0112-13

近年来，关于晚近历史的中外文献以各种形式大量公布于世。学者通过研读新史料，可以更为全面深入地探讨相关历史问题。笔者最近整理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遗存的中文档案（以下简称“英商馆中文档案”），就发现其对于认识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史大有裨益。这批档案归入英国外交部档案中，编号为 F. O. 1048，共 1232 件。除 1 件为乾隆年间文献外，其他均形成于嘉庆七年（1802）之后，下迄于道光十四年（1834）。这 1200 多份档案文献，除少数英文底稿外，绝大部分是中文文件，按形成方式，可分为原件与抄件两类。原件包括：（1）广东官员直接发给英国商馆特选委员会或大班之谕令；（2）官方通过行商转给英人之谕令；（3）行商等致英商馆特选委员会或大班之函件；（4）英人呈送广东官员禀帖之底稿；（5）英人致行商或其他人士函件底稿；（6）其他文件，如各种告示、名单、礼单、海关税单、商馆会单（票据）、债务表、未具名的信函等。抄件包括：（1）官员饬行商传谕英人之文件；（2）各类官方文书，多为英人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的官员奏、谕、札、禀等文书，另有少量上谕、甘结、供单等；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招标项目“清代广州口岸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号 14ZDB043）的阶段性成果。

(3) 英商馆特选委员会及其他英人各类外行文(如禀帖、函件等)的清抄件;(4) 行商禀帖、信件等文书;(5) 其他,如英人以外其他外国人的禀帖、函件、证词,行商、茶商的帐单、订单,中外交往的历史文献,甚至有1份越南人因国内政局致英人求助的文书。总之,内容相当丰富。

笔者在整理过程中通读了这批档案,对其在清代中叶中西关系史方面的研究价值有初步体会,已尝试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其中的部分文件。同时,笔者也认为值得对其加以专门介绍,俾便学界同仁了解。兹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 一、与已刊中文史料互补

学术界研究19世纪前期中西关系史,一向重视中文原始文献的使用。自1930年代起,有不少文献陆续刊布。其中,创刊于1930年的《史料旬刊》,有多个关于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史料的专门栏目。1932-1933年由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清代外交史料》(嘉庆、道光二朝)共10册,辑自军机处档案,作为重要的专题史料,与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一起,形成较完整的研究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史的档案文献。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内容更为丰富,现在是研究道光时期中外关系史和鸦片战争史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此外,《文献丛编》各辑也按不同的专题刊布了不少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史档案资料。这些史料书中的雍正、乾隆两朝的资料,均为英商馆中文档案所无,在时间上形成互补关系。

上述史料之主要内容,为清朝官方文献如上谕、奏折,以及英国等国的外交照会,主要来自清朝朝廷和中西官员,可概括为“官方文献”。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广州成为清朝对欧美国家开放的惟一海路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前中西交往事务大多发生于广州。除官府外,活跃于这一口岸的中外商人及相关机构、各种与贸易相关的人物,实为中西交往之主体,但“官方文献”对其记述不足。正因为如此,以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及中国沿海之中西交涉为主要内容的《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和《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二书公布之史料,才在清前期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中显得极为珍贵。此二书与本文讨论的英国商馆中文档案具有相近的性质,可略加比较,以说明各自的价值。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是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抄录自英国的档案文献,与《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二书,同为十分重要的研究资料,刊行后对鸦片战争史、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史研究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于1967年刊行。从时间上看,该书史料与英商馆中文档案具有明显的前后承接关系。<sup>①</sup>该书第一部为“道光十四年文书”,其内容始自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结束、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来粤之时。从其内容来看,二者所收文献的类型也基本上相同,均为广州口岸产生的中西交往文书,而非官方形成的档案。这两种史料合在一起,可以较为完整地呈现19世纪前期广州口岸中西交往、特别是中英交涉之面貌。

《达衷集》是著名学者许地山先生应罗家伦先生之托,抄录自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史料。该书于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仍为研治清前期中英关系史的必备史料。许先生在弁言中说,“这书是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夷馆存放的旧函件及公文底稿”;又云:看到“夹在‘上海事情’中有《尺牋类函呈文书达衷集卷中》的标题和目录,所以知道他的原名”,即其完整的原名应为《尺牋类函呈文书达衷集》。<sup>②</sup>这部资料分为两卷,一卷是英国商人胡夏米(英文名 Hugh Hamilton

Lindsay, 又译林赛) 1832 年在中国东部沿海航行时与各地人士的往来函件, 以及嘉庆年间英国商馆与广州官员、行商的往来文件, 另一卷则是“汇录乾隆、嘉庆二朝公班衙与广州督抚关部等交涉的案件”。<sup>③</sup>

许先生的《弁言》告诉我们,《达衷集》与英商馆中文档案实际上同出一源,均为商馆遗存的中文文献。除许先生的上述介绍外,尚有如下理由支持这一判断。《达衷集》与英商馆中文档案的内容多数不相重复,该书所收胡夏米航行于中国海岸及朝鲜、琉球的文件(1832年),为英商馆档案所无。《达衷集》存有多件乾隆年间的中文文书,亦为英商馆中文档案所缺;而英国商馆中文档案中惟一的一件乾隆年间中文文书,即英国摄政王致乾隆皇帝国书,却又为《达衷集》所无。很明显,《达衷集》中的文书是从英国商馆所存的中文文献中抽取的,其数量只占一小部分,剩下的1200多件才是这批材料的主体部分。至于何人、何时、何故将这103件文书抽取,编为无法确切理解其意的《达衷集》,又如何能在脱离其母体后辗转落入牛津大学图书馆,如无新的资料作为线索,则难以明了。

二者也有相互重复的部分,主要是1810年“黄亚胜案”相关文献。1810年1月6日,在广州承远街合盛缝衣店做工的黄亚胜,在街头被外国人刺死,与其同行者指证黄为英人所杀,后来甚至确定了凶手姓名。但英人否定凶手属于其船,拒绝交出,引起广东官府和英国商馆之间的多次交涉。由此形成的文书达数十件,其中《达衷集》收录了11件。经过比对,笔者发现:凡广东官府下给英商馆之谕,《达衷集》所收均为抄件,因为带有官印的原件均留在英商馆中文档案当中;凡商馆上呈官方之禀,英商馆中文档案中所存者或为禀底,或在禀底之外另有清抄件。更值得注意的是,《达衷集》中的11件文书与英商馆中文档案中的相关文件相比,在字句方面也有所不同。考虑到《达衷集》为学界长期使用的史料,而英商馆中文档案正式出版后相信亦将得到重视,故有必要结合具体文本对其中的几种情况略作说明,供将来的研究者参考。二者之间的区别大致有以下数种情形:

(1)《达衷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英商馆中文档案缺损之憾。英商馆中文档案的不少文件,在过去200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了较严重的蠹蛀现象,造成页面破损,其中包括“黄亚胜”案的档案。而许地山先生在八十余年前所见抄本似乎未有大的损坏,故《达衷集》字句基本上是完整的。

(2)《达衷集》与英商馆中文档案文件字句有异。如英国船主武礼班克上粤海关监督之禀帖,提到其船损坏,希望放其出口,到印度之望买(应即孟买——笔者)修理,英商馆中文档案此件中此地名即写作“望买”,而《达衷集》此件此二字则在左边都有“口”旁,<sup>④</sup>符合当时正式公文中对外国人名、地名基本上都加上“口”旁之通行写法。又如《刺佛致行商书》,《达衷集》此件开头有“弟等得接仁兄于本月初四日由省付来之信一封,内包南海县太爷之钧谕,再发起来而论,民人黄亚胜被戮伤身死一事”。<sup>⑤</sup>而英商馆中文档案此件则写作“弟等得接仁兄由省于四月初四日付来信一封,内包南海县太爷之钧谕,所论民人黄亚胜被戮伤身死,再发起来一事”。<sup>⑥</sup>两相对照,可见英商馆中文档案的文意更明白一些。又如《亚士但上广州将军禀》,《达衷集》中此件提到两广总督不肯接收其禀帖,有“是亦见无非不得办公道明白”之语,而英商馆中文档案此句则为“是易见非无不得办公道明白”。<sup>⑦</sup>两句都欠通,说明拟稿者汉语写作程度尚低,但两相对照,则是《达衷集》里句子意思明白一些。

(3)《达衷集》中文件也存在不少错、漏字句。如《刺佛上两广总督禀》,《达衷集》此件

第3行谈到此案,说“据地保禀报,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显然此时间不对;<sup>⑧</sup>看英商馆中文档案此件,发现“六年”如为“上年”之误。<sup>⑨</sup>又如《亚士但上广州将军禀》,《达衷集》开头一句“……亚士但禀请将军大人万福金安”,<sup>⑩</sup>而英商馆中文档案中禀底此句在“将军”之前有“镇粤”二字;英商馆中文档案此件在禀文之后尚有数行“本月初十日之禀,督宪不接到同包并该禀,抄出红单系总督所传,然与人证所供不对。现敬奉大人照看。大人要视人证所供后抄,可奉也。谨此。”又署日期为“嘉庆十五年正月初十一日、英吉利国一千八百一十年二月十四日由省城禀”。<sup>⑪</sup>这几行字和日期均为《达衷集》中此件所无。又如,《南海县下洋商谕》,《达衷集》中有“夷众来粤贸易,刺佛是其专营”之语,而英商馆中文档案中该句为“……刺佛是其专管”,显然前者抄错了;《达衷集》该件又将乾隆四十九年来粤英船名“会廉船”误作“会兼船”;“情形”误作“情刑”,等等。<sup>⑫</sup>

以上所述并非二者相异之处的全部情况。从这里的例子可以看出,已刊的《达衷集》既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可以与英商馆中文档案相互参证、相互补充;同时,也应看到,在传抄过程中,《达衷集》文本有错漏现象,我们在使用这一史料时,应当注意这一点。这两种同来源的史料,形成于近200年前的中国,因尚不清楚的缘故被分开。100余年后《达衷集》由许地山先生抄录刊行;预期不久之后,份量更大的英商馆中文档案亦将正式出版,完璧可期。合而观之,可对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史形成更全面的认知。

## 二、与英文资料互证

英商馆中文档案是中英互动的原始记录。英商馆在长期活动中留下的更大量记录,是东印度公司英国商馆的英文档案。这些档案现在可以见到,但对国内学者而言,使用仍不方便。而马士的名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则是在仔细研究这些档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资料性著作,问世后成为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将该书所载史料与英商馆中文档案对照使用,可以更清楚地观察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

《编年史》写作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以贸易史为主要内容的同时,记述中英(西)关系或广州口岸的重要交涉事件,每年一章,每章即以该年份最重要事件为标题。对于每一个这样的事件,英商馆中文档案几乎都有相应的中文文件与《编年史》的记载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例如,1809年《编年史》的标题是“清剿海盗”(第65章),书中有数页篇幅记载广东当局借助英人、葡人力量打击海盗的过程,而英商馆中文档案中则有10余件文件与此相关。<sup>⑬</sup>又如,1817年《编年史》的标题是“行用”(第74章),该章提供了1807-1816年10年间行用具体数字及其用途的资料,而英商馆中文档案则提供了更详细的数据,以及1817年各行商应摊及实摊行用中“贡价并册费银”之数字。<sup>⑭</sup>每个年份的情形,大都与此相同,在此不必一一叙述。以下通过几个具体事例,进一步说明这两种不同语言的史料在互证史事方面的价值。

关于松筠与中英交往的史料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100余年中,一个长期困扰英国商馆和广东当局的问题,就是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龃龉和冲突。而两广总督松筠在任期间与英人关系良好,互动顺畅。松筠曾经接待、护送过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与英人颇有渊源。他于嘉庆十六年(1811)正月至九月任两广总督,英人对其较为尊重,而松筠则待英人颇亲切。故《编年史》第67章以“与总督的愉快关系”为题,以数页叙述了这段关系。<sup>⑮</sup>英商馆中文档案则提供了双方交往的多份具体材料。这些文件显示,先由行商告知幼时随马戛尔尼使团

觐见乾隆皇帝的英商馆三班斯当东 (George Thomas Staunton), 说松筠忆起当年相处情形, 建议具稟请安; 英商馆即具稟祝贺松筠到任, 并派斯当东前往总督衙门谒见, 致送礼品; 不久后松筠巡阅澳门, 英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益花臣 (John F. Elphinstone) 再次具稟请安, 并致送礼品; 松筠不久后回京转任吏部尚书, 特选委员会又具稟致贺, 并感谢关照。松筠亦谕复英人, 嘉许诚悃, 并回礼答谢。<sup>⑩</sup> 双方如此善意互动的记录, 在鸦片战争前的中西交往中确属少见。

松筠与英人之间的联系并未因其回京而中断。1813 年, 广州林广通事馆帮办通事李耀 (一般称其阿耀) 进京捐职。阿耀平时与益花臣等关系密切, 故益花臣委托他带信件、礼物给松筠。但当时嘉庆帝对大臣与外人交往很警惕, 松筠因避免通外嫌疑拒绝受礼。通事阿耀在次年回广州后被捕, 受到严厉审讯, 英人认为此事与阿耀与英人关系密切、充当信使之事相关, 故对阿耀的逮捕和监禁是对英国 “国家名声” 的侮辱。广东当局则加以否认, 但在逮捕阿耀后又的确从其家中查抄松筠之子给阿耀的信件。双方就此展开长时间相持和争执, 甚至出现走向对抗的趋势。《编年史》对此过程有所叙述和评论。<sup>⑪</sup> 而英商馆中文档案则提供了多份第一手文献, 包括益花臣等上松筠的稟帖、礼单, 松筠向嘉庆帝奏报此事之奏底抄件、阿耀关于拜会松筠的记述、次年被捕后在狱中被追问此事的记录、两广总督蒋攸铉等与英商馆特选委员会的往来谕、稟, 等等文件, 数量不少。<sup>⑫</sup> 这些文件, 不仅显示了中英交涉的一个侧面, 而且提供了研究清廷对外态度和清廷政治生活的线索。

关于中英冲突的史料 上述事件只是嘉庆年间中英关系的一个片段。从 1810 年到 1815 年, 因黄亚胜被刺案、行商的商欠问题、英商馆特选委员会前主席刺佛的回任问题、英国兵船 “罢殓仁号” 盘踞珠江口的问题、英人与中方文书往来之格式与规范问题、商馆使用华人仆役问题, 等等, 中英之间展开了长时间的较量, 上文提到的阿耀案与这些事件交织在一起, 使中英关系从冲突而至僵持, 几乎走向决裂, 最后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达致暂时的妥协。对这个过程, 《编年史》第 3 卷共有 6 章涉及,<sup>⑬</sup> 记述了这几年来中英冲突之基本史实。但这部著作毕竟以贸易史为主要叙述主题, 在 100 余页的内容中, 记载中英关系演变过程的只占一小部分。而这几年当中英商馆中文档案则提供了中英交涉的数百份文件, 数量非常可观。这些文件不仅印证了《编年史》的叙述, 证明其所载史料的可靠性, 而且作为中英交涉的原始纪录, 展示了《编年史》所无法揭示的深层史实。具体而言, 从 1810 年开始明显化的广州行商集体性经营危机, 造成中英双方在广州口岸的权力格局中此消彼长的局面。英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利用在资金、经营等方面的优势, 开始插手贸易事务的安排, 具体做法是以在行商间重新分配进出口贸易份额, 使那些疲乏行商不致破产, 以维持对其有利的贸易格局。《编年史》固然记载特选委员会 “拯救” 疲乏行商的相关史实, 但英商馆中文史料却揭示了行商在经济上依赖英人的程度。<sup>⑭</sup> 英商馆前主席刺佛甚至直接安排本应破产的会隆行的经营事务, 安排不具备行商资格的司事吴亚成经理行务, 而让能力欠缺的行商郑崇谦靠边站。对这种标志着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权力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事件, 《编年史》对此略有记载, 但英商馆中文档案则有多件反应英人的具体安排, 亦将广东官方与英人之间围绕此事展开的各种交涉和较量展现出来。<sup>⑮</sup>

在随后几年围绕一系列问题展开的中英冲突过程中, 形成的中文档案达数百件。这些详细的中文交涉史料, 均可与《编年史》的记载相互印证和补充。为避繁琐起见, 这里不一一说明。<sup>⑯</sup> 但应该提到的是, 这次冲突以两广总督蒋攸铉代表的广东官方罕见的让步而告结束, 其标志是粤海关监督祥绍在嘉庆十九年十月廿一日 (1814 年 12 月 2 日) 公布了一个经双方谈判、蒋攸铉批

准的“贸易新章”。这份文件满足了英国人在文书往来、交往方式、贸易管理、生活条件、船只进出、内外交通等方面提出的要求,反映了嘉庆年间广州口岸中西关系在具体层面的真实状况,有些内容(如中英文往来的规定、双方交往的方式)与关于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状况的既有结论存在差距。英国人与广东当局进行博弈和谈判的能力,以及广东当局在强势的外表下格于形势不得不向英人妥协的真相,都很值得研究者注意。<sup>②</sup>《编年史》的作者看来没有注意到这份具有重要意义文件,英商馆的英文档案中是否有该件译本,待查。但即使有译本,其价值也无法与中文档案中的这份原件相提并论。

鸦片战争前中英之间发生激烈对抗的另一事件,是1829-1830年的冲突。这次冲突对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西关系演变具有更直接的影响,需要专论。这两年英商馆中文档案保存下来的有100余件,共300余页,同样反应了中英冲突的具体过程。其与《编年史》所载史料的互证关系,与1810-1815年冲突时期的文献相似,为节约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广州体制变迁的史料所谓“广州体制”,是指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广州口岸的中外通商制度。这个制度论述者众,但不少论者以静态眼光看待这一制度,而比较忽略其动态演变之过程。《编年史》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值得加以深入研究。但限于该书编年史体例,论者无法从中获得完整的原始文献。而英商馆中文档案所提供的多份史料,则呈现了的“广州体制”在鸦片战争前逐渐变迁的过程。上面提到的1814年“贸易新章”之订立,即为“广州体制”演变的典型例证,这份文件在认识“广州体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迄今未获应有的注意。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围绕行外商人参与进出口贸易的文献。

所谓行外商人,是指十三行商馆区附近的店铺主,他们多从事与中外贸易相关的各种生意。<sup>③</sup>这些商人逐渐渗入本由行商垄断的贸易当中,与行商、外商以及官府之间形成复杂的利益关系。他们直接介入中西贸易,乃是对“广州体制”的一种蚕食。行商在很长的时间里,因为缺乏资本、贪图小利等各种原因,默许行外商人用他们的名义从事进出口贸易。但一旦认定这种渗透威胁到他们的根本利益,行商即不再容忍。据《编年史》记载,1828年,一个叫做“李九爷”的商人试图成立一个新行,“以图独占对美国人的贸易”,在受到行商阻止后,又打算作为“秘密经纪”来承揽行外商人的进出口贸易事务。感到利益受到侵犯的行商一面向英商馆特选委员会通报,“打算停止行外的店铺主经由他们行号进行的贸易”;一面“向海关监督呈禀”,请重申相关禁令,以“制止这种非法贸易”。特选委员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行商的决定表示支持。然而,美国商人、英国散商和印度商人则要求按照“旧例”与行外商人交易,而不认可停止行外商参与贸易的“新”做法,向行商施加压力,行商则因此准备妥协。这个结果引起英商馆特选委员会的“愤恨”,他们致函两广总督李鸿宾和粤海关监督延隆,提请他们注意,如果“决定行外交易合法”,“则本口岸的商业性质会有重大改变”,而维持行商独占贸易的制度,则将能平息纷争。美国商人和英商馆特选委员会为此产生争端,将争执诉诸广东官方。两广总督先是决定支持特选委员会,后又因行商与美国商人之间的妥协,而将对行外商人参与贸易的限制放宽。<sup>④</sup>这个复杂的过程表明,制度上规定的行商对进出口贸易的“垄断”早已被打破,行外商、行商、英国散商和印度商人、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等各方在不同情势下的具体利益的博弈,导致了相互妥协的最终结果,而拥有裁决权的官方也没有坚持名义上的“体制”,认可了这种利益平衡的结果。这样的制度变更和运作过程,与“行商垄断贸易”之类的表述相去甚远。

英商馆中文档案更清晰地体现了这种过程。早在1814年,行商们为杜绝行外商之“罔顾成

规，肆行抢夺”，就议定行外铺户交易的章程，交由海关监督公布施行，这份章程提供了允许行外商参与贸易的八种次要进出口商品的名称。<sup>③</sup>但行外商的交易并未因这种规定而绝迹，故官方不断谕示禁止，如1827年粤海关监督命通事陆辂等不得为行外商的非法生意代报关税。<sup>④</sup>到行外商问题突出的1828年，英商馆中文档案中出现多份相关文件。其中，3月13日，行商致函与行外商交易的美国商人葛吾（Gordon）等，表示将不会为行外商代报入口收取饷银。<sup>⑤</sup>但十二天之后，行商就在这件事情上妥协，通知英商馆特选委员会，因美国人“到行吵闹”，行外商又“多有抱怨”，他们“受骂无穷”，决定“随各夷商自便，照旧例办理”。<sup>⑥</sup>正是这封信引起英国大班部楼顿（W. Plowden）等的“愤恨”，回函指责行商“软弱无定”，违背双方“经严然立之议约”，表示将惩罚背约的行商及通事。<sup>⑦</sup>同一天，部楼顿通知总商伍浩官，特选委员会取消原打算借给天宝行商经官梁承禧三万元供其缴纳税饷的承诺，因为经官背约，允许行外商以其名义交易。<sup>⑧</sup>部楼顿等闻知有人就此向“上宪”递禀“攻论本公司主事列位”，又致函浩官等，要其向官方说明双方立约、行商背约的原委。<sup>⑨</sup>当李鸿宾和延隆公布了行外商参与贸易的规定后，部楼顿等写信给行商，警告其让行外商“代搭”货物贸易的风险，表示还将惩罚“犯约”的行商，即削去其与英公司贸易的份额。<sup>⑩</sup>这些文件，透露了诸多丰富的历史细节，将其与《编年史》所载史料相互参证，可以还原出19世纪前期贸易体制运作偏离名义制度，英人在贸易中的地位日渐加强，行商因经济困顿不得不仰英人鼻息之实态。这又与当时英人出于特定目的渲染其屈辱地位的大量文献，形成令人深思的对照。

关于“广州体制”变化的史料，值得注意的还有关于废止连带责任制的文件。行商体制连带责任制，即行商相互连保以相互承担债务责任制，亦可视为“广州体制”的一个特征。由于这一制度令整个行商体制在不断出现行商破产案的情况下面临重大危机，广东当局与英商馆特选委员会在1829-1830年协商决定将其废止，即逐渐取消各行商摊还破产行商债务的责任。<sup>⑪</sup>《编年史》记录了此事经过，而英商馆中文档案中则有文件表明，行商在3月18日正式通知英商馆特选委员会，两广总督李鸿宾作出了废除连带责任制的决定，说明以后外人借款给行商，该行商如破产，其他行商不会如前负摊还责任，故外人不可“滥信”借贷。此件为《编年史》所未提及。<sup>⑫</sup>虽然李鸿宾主导、英商馆特选委员会支持的这一“新政”最后没有真正落实，但这些资料仍然显示了“广州体制”变化之多重因素，有助于学者加深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

英商馆中文档案中可与英文记载相互印证的历史文献还有很多。此外应指出，《编年史》引述的中文文件原件，大多可在英商馆中文档案中发现，故将这两种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可以在更深入的层面讨论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史的演变。

### 三、为中西关系史研究提供新的文献

以上所述英商馆中文档案与已知文献互证、互补，指的是其中的部分文献在认识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史问题上可以起到的作用，并不是说它们与已知文献的重复，或只是补充性的史料。作为第一手原始文献，这些史料在研究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英商馆中文档案中还有更多的新史料，可提供学界迄今所未了解的历史信息，研究者可据以更全面、更透彻地认识19世纪前期中西关系史上的问题，特别是以往学界因未掌握史料而较少涉及或讨论不充分的问题。以下选择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介绍相关重要史料。

关于早期澳门史的史料1817年英商馆中文档案中有一组名为“成案四件”的文件。与澳门

早期历史相关的这4份文件，在档案中分别有编号。在此之前另有编号为F. O. 1048/17/51的文件，为该4份文献之目录，以英文说明这是“据说于澳门议事会刻石之四份文件”，并注明各件的简要内容。4份文件中，标题为“关于中国士兵衙役榨取钱财，1693”的文件内容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二月二十八日，香山县令奉广东按察使陈子威令，公布两广总督石琳批“远西艾学士家人王良”呈文及示“濠镜澳彝目理事官”谕。王良呈文内容是申诉澳门土棍“串通营弁兵丁或县佐典史差役”，假借各宪名目，吓诈勒索西洋人员钱财。石琳和陈子威令香山县严厉查禁此种积弊。王良呈文中还述说西洋教俗各种名号译法，陈子威亦谕“悉照翻译名色称呼，不得仍行混立名色”。<sup>⑤</sup>标题为“1698年商品关税”的文件内容为：康熙三十七年（1698）十二月初二日，督理濠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委黎多、澳商禄的理公沙路和澳商文兰斯理拉，呈“粤海关吴、存二位大老爷”禀帖。其中，“吴”应指粤海关监督吴礼善，“存”何所指，待查考。委黎多等诉陈“澳门船饷独重，年来遂有停帆绝食之苦”，要求将粤海关税饷额减为4万两，将广州口岸的西洋船饷“比照东洋船旧例征收，永为定额。从此远商复苏，饷无旷缺”。呈文中还将“东洋旧制”各等船所纳饷银列出，要求吴礼善等“疏题奉旨”。<sup>⑥</sup>标题为“关于与交趾支那及他处之贸易，1718”的文件内容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四月初八日，两广总督杨琳发香山县转发澳门张挂晓谕：已上奏请旨，准澳门西洋船往安南及吕宋、噶嘞吧等处贸易，但重申不得夹带“中国之人，并内地商人偷往别国贸易”，这表明了清政府在管控海外贸易的同时对澳门葡人格外宽容。<sup>⑦</sup>标题为“关于修船事务，1722”的文件内容为：康熙六十一年（1722）三月二十一日护理广东香山协镇副府钱×发布告示，称两广总督杨琳准澳门西洋理事官禀呈，“嗣后修理彝人洋船，听彝人自行雇匠，毋许狡棍混称头人名色，把持抑勒”，同时规定修船所用钉、油等项，须呈准采买，“不许夷人串通船匠私自夹带；止许修整旧船，不许打造新船”。<sup>⑧</sup>显然，这些文件都是关乎早期澳门史的重要文献，涉及清政府对澳政策的多方面问题，但注重显示“怀柔”的一面。这些史料对于早期澳门史的研究，当不无裨益。

关于阿美士德使团的史料 1816 年英使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访华，英方最初向中国官方通报并就相关问题展开交涉，是由广州英国商馆与广东官府联络进行的。英商馆中文档案中保存的这方面原始文献共 27 件，其中，英方通报及中方询问相关情况的 11 件，英方礼单 5 件，英使团名单 4 件，英国国书中英文各 1 件（共 2 件），英方关于觐见礼仪的文件 2 件，其他 3 件。这些文件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阿美士德使团使华的情况。关于使团来华之事，英方直至嘉庆二十一年五月初三日（1816 年 5 月 29 日），才由英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斯当东通过行商向护理两广总督董教增禀报。斯当东从澳门送给伍浩官等一封急件，告知“英吉利国王遇太平幸时，遣一位侯爵大使臣，随带礼物、恭贺文书，进京朝谒大皇帝”，须立即奏报皇上。他在给董教增的禀帖中说的更为具体，告知“世系侯爵罗尔阿美士德一位大使臣过来中华国，进都献礼朝谒，恭贺万安”，已于“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内驾船即离本国起程，望由直隶天津进京，故计本月间可到也”，要董急速奏报，以免船到天津，皇上还未得知消息。<sup>⑩</sup>英方这种突然袭击式的通知，是为了避免中方要求其从广东出发、按照贡使程式接待使团进京的安排。对此毫无准备的董教增等，多次下谕询问有关情况，以便奏报皇帝。在 1814 - 1815 年的中英冲突和交涉中，斯当东扮演了广东当局强硬对手的角色，嘉庆帝也在谕旨中要两广总督蒋攸钰调查斯当东。<sup>⑪</sup>此次斯当东充当使团副使，自引起广东当局的关注。潘启官专程拜访英商馆中文译员马礼逊，后者将潘启官转达的官方意思写成数页的英文备忘录，也保存在这批文献中。<sup>⑫</sup>这也是英商馆中文档案中少数几件

英文文件之一。这批材料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份阿美士德的所谓“奏折”底稿，阿美士德在其中说道“我国主令臣在大皇帝面前时，即行我王差于乾隆五十八年在纯皇帝面前所行之礼，即是跪一膝、俯首，且再、三行此礼，依最恭之数也。我英国各王差除中华国大皇帝外，实不行是大礼与何国主矣！”<sup>④3</sup>这份底稿的落款日期是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二十七日（1816年8月20日），即使团抵达通州之日起草的，当为后来使团经广州回国时，将其留在广州商馆，进入商馆档案之中的。此外，还有1816年8月26日译文英文、由礼部官员拟定的觐见皇帝典礼仪式一份，较详细地说明了礼仪细节，其中多次提到“跪拜”、“叩头”，涉及英人最为重视的礼仪细节。<sup>④4</sup>这两份文献可看作双方“礼仪之争”过程之原始纪录。此外，这批材料中的英国摄政王致嘉庆帝的国书，是一份中文清抄件，当然也很值得研究者注意。<sup>④5</sup>无疑，这27份中文文件，对了解阿美士德使团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于1833年淇澳岛中英冲突的史料 1833年，发生在金星门附近淇澳岛的中英冲突事件，一度引起研究者的关注。<sup>④6</sup>但关于这一事件的史料不多。刘存宽先生曾翻译过英文《中国丛报》刊载的有关中英交涉文书5件，<sup>④7</sup>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但其中的中英交涉文书并非中文原件，且数量仅有5件。英商馆中文档案中保存了关于这一事件的中文交涉文书21件，其中1833年19件，1834年2件。这些文件呈现了1833年9月金星门英国鸦片船水手与淇澳居民之间冲突的过程，以及事后英国商馆特选委员会与广东当局之间交涉的经过。关于这一事件，时间上最早的中文文件是香山县令给英国大班的谕帖，告知有淇澳村更保钟际云，禀报八月初一日（9月14日）“有夷人入村，争买什物，特蛮捉去郭名秋，放枪致伤黄亚仰，抢去黄牛四只等情”，要其释放郭名秋，并交出凶手。<sup>④8</sup>5天后，香山县令又谕英国大班，说有“左埗头村民孙振棉禀称：伊与弟孙亚福驾艇在淇澳村前海面捕鱼，于九月初三日巳牌时候，突有夷船三板十余只驶入村前，施放枪炮，奔避不及，被夷人用鸟枪致伤孙亚福，禀乞验究等情”。<sup>④9</sup>这两份材料，提供了事件开头的细节，以及具体的人名地名。其后，广东各级官府与英商馆特选委员会之间展开数月交涉，留下多份往来文书，提供了事件发展及双方交涉的更多细节，也留下更多卷入其事的村民及相关人士的姓名，这都是以往研究者难以了解到的。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这一事件，《编年史》亦有记载，<sup>⑤0</sup>故在文献价值方面本可将这批材料归入上节“与英文资料互证”的范围。不过，这个事件在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史上有特别的意义，而国内研究者似少有提及者，故在此处介绍，以期引起有兴趣者的关注。

关于买办问题的史料 买办和买办制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现象。买办这一群体起源于鸦片战争之前，长期为研究者所重视，但直接史料却不多见。英商馆中文档案中保存了多件与买办相关的史料，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以往的缺憾。在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口岸，买办对于中外贸易，特别是对外国来华商人，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其地位不高，常受官员、差役人等的压抑勒索。1821年12月初，英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咸臣（James B. Urmston）致函伍浩官等，告知其船用买办申诉遭到濠墩巡船、关口人员的勒索，要求行商帮助解决问题。<sup>⑤1</sup>咸臣在次年八月又致函伍浩官反映，英公司船只已到，却无买办前来服务，原因在于“关口勒索规银太多，其充买办各人不情愿做，因怕折本故也”，要求伍浩官等“代出力调妥此事”。<sup>⑤2</sup>多份文件反映，买办处境艰难，并非仅因官役勒索，亦因受外人苛待。1831年，有蔡懋等4位通事联名致函英国散商查顿（William Jardine），说买办为港脚船服务，因所得不多，且需缴纳规礼银等费用，长期入不敷出，需外国船主和通事们帮衬；1830年蒙总督将黄埔关口减规礼银250元，未料港脚船主亦

相应将其原本所帮 300 元减为 50 元，等于船主受惠而买办、通事等未获寸利。故蔡懋等表示不再代英港脚船雇佣买办，令其自雇。函末还详细开列了各港脚船在 1830 年原本补贴黄埔买办的具体数字。<sup>⑤</sup>

买办是处于中国官府和西方商人联合压制之下的小人物。为了加以控制利用，各方为其制订了相应的规章。这方面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鸦片战争前买办制度进行深入的了解。1831 年初，两广总督李鸿宾谕澳门同知，申斥其对召充买办之事“因循玩忽”，其中透露了历年实行买办规章的情况。嘉庆十四年（1809）四月，两广总督百龄奏《华夷贸易章程》，谓买办原由“澳门同知给发印照，近年改由粤海关监督给照”，但粤海关监督因在省城，“耳目难周”，致滋弊端，规定“嗣后夷商买办应令澳门同知就近选择土著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结，始准承充，给与腰牌印照”；澳门同知负责稽查在澳门服务的买办，番禺知县负责稽查黄埔买办。<sup>⑥</sup>李鸿宾在谕帖中说，该章程施行后，由澳门同知召充之买办不服番禺知县稽查，番禺县稟请由该县选充，但未获准；澳门同知请令通事选充，“而通事不肯妄保”；故嘉庆十七年（1812）广东官府又重申澳门同知召充买办之责。但澳门同知在这方面显然措置不力，以致李鸿宾下谕申斥，并命“亟应示召选充，以专责成”。<sup>⑦</sup>这则史料显示，广东官府对买办的管理制度也处于不断变化当中。买办面对的另一方是外国来华商人，后者对其亦有相应的规定。1828 年 2 月，英国商馆特选委员会公布了一份《英国公班衙主事等指示买办各条例》，规定买办在业务上应遵循的 5 条规定。另外，又公布《英国公司买办代出银两数分开纲领三件》，列出买办负责的英公司各项开支的细目 50 余项，分为“贸易事务使费”、“无常使费”和“省城行内开支”三大“纲领”。<sup>⑧</sup>细读这些材料，不仅可了解买办制度的运作状况，还可据以研究中外贸易其他方面情形。

关于通事问题的史料 在鸦片战争前，通事在层级上高于买办，故有稽查或管理买办之权责。通事在此时期亦为中外贸易体现中具有较重要地位之角色，同样存在各种问题。如咸臣在 1822 年 9 月 12 日致函伍浩官等行商，指当时通事办事不善，“屡致误事”，且数量不到四、五人，而公司事务又不可专委陆辀、蔡江等少数人办理，要求“众位商量妥议，善处此事”。<sup>⑨</sup>次日，卢棣荣等 3 位行商致咸臣，指通事张允森办事错谬，不敢令其办事。<sup>⑩</sup>14 日，伍浩官等 10 位行商集体复函咸臣，详述无法允许通事张允森办事之缘由。<sup>⑪</sup>前述通事需为买办代填补亏空，说明其职业有一定的经济风险。英商馆中文档案中有一件史料显示，这种风险也来自外国商人。1833 年初，通事蔡宪向英商查顿投诉，1829 年印度商人白沙厘以欺骗手段逃税，蔡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代交 225 元饷银，但白氏拖延不还，致其面临损失。<sup>⑫</sup>这些史料比较零碎，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鸦片战争前通事作为一个特定群体之状况。<sup>⑬</sup>

关于保商问题的史料 鸦片战争前，广东当局令各行商分别充当外国商船之保商，为其缴纳税饷及其他方面的行为作保。作为保商的行商承担为外商负责的义务，经常招致官员的责罚乃至惩处，故常心怀怨怼。1817 年夏，广州行商集体作出一项决定，要外商将来来粤贸易，须出具不运鸦片的甘结。尚未得到回音时，他们又决定停保港脚船。此举引起英国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觅加府（John Metcalfe）的强烈不满，他于 7 月 26 日致函伍浩官等，提出强烈抗议，强硬地表示，如果行商不为港脚船承保，则公司亦将停止与中国的贸易。<sup>⑭</sup>此事后以行商的妥协告终。1828 年，英商馆特选委员会又与行商讨论保商问题，多份文件显示，二者之间商定了英公司船由各家行商轮流承保的具体办法。<sup>⑮</sup>

关于洋米进口问题的史料 广东之进口洋米，为长期之现象。英商馆中文档案中亦保存了这

方面的史料。1824年,两广总督阮元奏准变通旧例,许各国夷船运米来粤后,装载货物出口,以示怀柔;粤海关监督达三谕行商将此传谕各国夷船。这显然是鼓励外商运米来粤的措施。<sup>④</sup>后广东当局就外商运米进口、运货出口的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细致的规定,在6月5日公布施行。<sup>⑤</sup>1831年4月,广东巡抚朱桂桢、粤海关监督中祥等发布告示,严禁关口员弁书役需索规费,致碍粮船进口,责令严查此类现象。<sup>⑥</sup>但谕令虽下,勒索粮船之事仍时有发生。1833年5月22日,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朱桂桢、粤海关监督中祥联名谕示行商,以近年外洋米船来粤不多,归因于关口勒索,再申严禁,于米船进口之时,关吏人等“不得需索分毫”;于米船载货出关之时,除应纳税银之外,丁役买办人等“不得另设名目格外需索”;并谕洋商、铺户等于受粮、交价等环节,多予米船方便,“俾夷船及早置货,转运往还,络绎相继”。<sup>⑦</sup>5天之后,这三位官员再次发布告示,重申“夷船放关,不准留难停搁,禁除陋规,以安夷商而便民食”,表明了官方在进口米船问题上的严厉态度。<sup>⑧</sup>1833年7、8月间,广东当局还多次发出此类谕示,<sup>⑨</sup>显示当局对保障外来米船贸易的措施是非常认真而急切的。这些文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广东粮食供应状况,是很有意义的社会经济史料。

在英商馆中文档案1000多份文件中,还有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例如,这些文件提供了很多行商、买办、通事的人名、行号,以及引水、地保等人物的姓名。这些底层人物是参与中西贸易、在中西关系史上曾经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其姓名历来难以查考。现在通过这些资料,可以顺利地解决不少以往令人犯难的问题。又如,茶叶为广州口岸贸易之大宗,但历来茶商之资料较为缺乏。英商馆中文档案中有几件茶叶商人的文件,可谓弥足珍贵。1819年,安徽绿茶商人议定交易章程数条,即收在档案之中。<sup>⑩</sup>1820年,骛馨行茶商致函英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咸臣等,述说困境,要求英公司予以关照。他还开列了历年经营茶叶贸易的数字和亏蚀的数额。<sup>⑪</sup>此件显示出茶商与行商同样面临经营困难,且同样须求助于英人。至于和行商相关的文件,则为数更多,难以一一述及。笔者整理这批史料,自感获益匪浅。当继续努力,争取使其早日刊行面世,供有兴趣的学者共同研究。

①英商馆中文档案虽在1834、1835年分别有6件、29件文书,但与《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不相重复。其中,1835年在广州已无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正式存在,仅有两位代理人照管该公司的在华利益。这一年的29件文书多为以往年代(包括嘉庆年间)的零散文件。

②③许地山《达衷集》弁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2页。

④参见:F. O. 1048/10/20;许地山编《达衷集》,第105、106页。

⑤许地山编《达衷集》,第102页。此句标点有误,应为“再发起来,而论民人黄亚胜……”

⑥F. O. 1048/10/43。

⑦参见许地山编《达衷集》,第107页;F. O. 1048/10/23。

⑧⑩许地山编《达衷集》,第98、107页。

⑨F. O. 1048/10/31。

⑪F. O. 1048/10/23。

⑫参见许地山编《达衷集》,第109页第8行、第110页第1行、第111页第4行;F. O. 1048/10/90。按“情形”误作“情刑”,许地山先生整理《达衷集》时作了改正(见该书第111页),可见这些错误是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该书原本中就有,并非许先生抄错。

⑬F. O. 1048/9/4、5、8、9、10、11、12、13、22、23、24、26。

⑭ F. O. 1048/17/65。

⑮⑯ [美] 马士著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 区宗华等译校,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年, 第164~168、126~238页。

⑰以上内容见: F. O. 1048/11/18、19、21、23、24、37、45、59、60、82等件。

⑱见 [美] 马士著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 区宗华等译校, 第210~211、216页。阿耀的被捕及流放, 其背景和原因颇为复杂, 笔者有专文论述, 见吴义雄 《国际战争、商业秩序与通夷事件——通事阿耀案的透视》, 开封 《史学月刊》, 2018年第3期。

⑲英商馆中文档案中的有关文件见: F. O. 1048/12/57; F. O. 1048/13/3、20; F. O. 1048/14/58、74、75、79、89。

⑳如1814年5月, 七位小行商在致特选委员会的函件中说“弟等各行, 凡一切行务均蒙仁兄等留心代为打算, 弟等无不感激”。见潘昆水官等七行商致英商馆特选委员会, 嘉庆十九年四月初八日, F. O. 1048/14/15。

㉑有关文件见: F. O. 1048/11/27、47、62、63; F. O. 1048/12/4、68; F. O. 1048/13/14、15、26、30、31、32、36、41等件。

㉒关于这些事件及相关交涉史料, 可参见拙文 《国际战争、商业秩序与通夷事件——通事阿耀案的透视》(开封 《史学月刊》, 2018年第3期)。

㉓见粤海关监督祥绍谕英国大班益花臣等, 嘉庆十九年十月廿一日, F. O. 1048/14/101。

㉔关于行外商人的情况介绍, 见张晓辉 《近代粤商与社会经济》,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年, 第63~64页。

㉕⑤⑥ [美] 马士著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 区宗华等译校, 第179~183、375~379页。

㉖行商公同议定行外铺户与外商买卖新章, 嘉庆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F. O. 1048/14/100。

㉗粤海关监督文连谕通事陆辂等, 道光七年十月廿九日, F. O. 1048/27/20。

㉘行商致葛吾等美国商人, 道光八年二月十六日, F. O. 1048/28/8。

㉙行商致英商馆特选委员会, 道光八年二月廿八日,

F. O. 1048/28/9。

㉚部楼顿等致行商, 道光八年三月初二日, F. O. 1048/28/10。

㉛部楼顿致伍浩官, 道光八年三月初二日, F. O. 1048/28/11。后因行商恳请, 特选委员会再允借经官三万, 但说明如再有允许行外商“搭报”, 即以其名义贸易之事, 则将“永不再借”(部楼顿致伍浩官, 道光八年六月廿五日, F. O. 1048/28/33)。浩官等随后函告, 经官已保证“断不做搭报之事”(伍秉鉴致部楼顿等, 道光八年六月廿八日, F. O. 1048/28/37)。

㉜部楼顿等致伍浩官, 道光八年三月初二日, F. O. 1048/28/13。

㉝部楼顿等致行商, 道光八年六月十三日, F. O. 1048/28/28。

㉞参见拙著 《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年, 第296~315页。

㉟行商致英商馆特选委员会, 道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F. O. 1048/30/3。此后, 广东还规定了清理以往行商债务的办法, 见 F. O. 1048/30/11、14。

㊱此件编号 F. O. 1048/17/52。

㊲此件编号 F. O. 1048/17/53。

㊳此件编号 F. O. 1048/17/54。

㊴此件编号 F. O. 1048/17/55。

㊵斯当东、吉顿致伍浩官等行商, 嘉庆二十一年五月初三日, 及所附斯当东呈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董教增禀帖, 嘉庆二十一年五月, F. O. 1048/16/20。

㊶见《军机处寄两广总督蒋攸钰: 将前者英船进口原委, 及英夷斯当东有无劣迹, 并洋商积欠该夷人等货价各事宜妥议具奏上谕》,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寄两广总督蒋攸钰等: 所奏夷商贸易及洋行各事宜, 照所议行并妥为处置英人斯当东上谕》, 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 故宫博物院编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 1932年故宫博物院印行, 第24~25页。

㊷“Memo from Puankequa, June 18, 1816”, F. O. 1048/16/28。

㊸阿美士德上嘉庆皇帝折, 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二十七日, F. O. 1048/16/45。

㊹礼部官员所拟阿美士德觐见嘉庆皇帝典礼仪节英文

译稿, 1816 年 8 月 26 日, F. O. 1048/16/46。

④⑤ 英国摄政王乔治四世致大清国大皇帝国书 (1816 年 1 月 19 日) 译文, F. O. 1048/16/42。

④⑥ 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论著见杨水生、刘蜀永主编:《揭开淇澳历史之谜: 1833 年淇澳居民反侵略斗争研究文集》,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④⑦ 刘存宽译 《东印度公司商馆委员会与两广总督往来文书》,《揭开淇澳历史之谜: 1833 年淇澳居民反侵略斗争研究文集》, 第 146~149 页。

④⑧ 香山县令田谕英国大班, 道光十三年九月初四日, F. O. 1048/33/53。

④⑨ 香山县令田谕英国大班, 道光十三年九月初九日, F. O. 1048/33/54。

⑤① 咸臣致伍浩官等, 道光元年十一月初十日, F. O. 1048/21/17。

⑤② 咸臣致伍浩官, 道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F. O. 1048/22/44。几天后, 伍浩官就此进行了回复, 咸臣又致函感谢, 见咸臣致伍浩官, 道光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F. O. 1048/22/50。

⑤③ 蔡懋、黄源、鲍良、何燁致查顿, 道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F. O. 1048/31/14。从该件可知, 当时在黄埔等地开始的买办馆有和合、同昌、茂昌、安利等号。

⑤④ 《两广总督百龄等奏酌筹华夷贸易章程折》, 嘉庆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 第 10 页。

⑤⑤ 两广总督李鸿宾谕澳门同知, 道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F. O. 1048/31/1。

⑤⑥ 英国商馆关于买办事务的规定 2 件, F. O. 1048/28/3。

⑤⑦ 咸臣致伍浩官等, 道光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F. O. 1048/22/72。

⑤⑧ 卢棣荣等致咸臣, 道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F. O. 1048/22/73。同日, 通事陆翰通知英公司, 同孚行召其负责英公司第 4 船事务, 他征得伍浩官等同意, 已接手操办。见通事陆翰致咸臣, 道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F. O. 1048/22/74。

⑤⑨ 伍浩官等致咸臣, 道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F. O. 1048/22/76。

⑥⑩ 通事蔡宪致查顿,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F. O. 1048/33/1。

⑥⑪ 1832 年的档案中有数件涉及到通事黄源退役, 见 F. O. 1048/32/16、17、18。在 1820-1830 年代档案中先后出现的通事馆名称, 分别有长茂、永和、宽和、长盛、和生、悦来等。

⑥⑫ 觅加府致伍浩官等, 嘉庆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F. O. 1048/17/68。

⑥⑬ 见 F. O. 1048/28/33、37、40、46, F. O. 1048/30/29 等件。1828 年 8 月 31 日, 英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部楼顿通知伍浩官, 英公司免除其承充保商之义务。见 F. O. 1048/28/48。

⑥⑭ 粤海关监督达三谕众行商, 道光四年二月初一日, F. O. 1048/24/9。

⑥⑮ 粤海关监督七十四谕众行商, 道光四年五月初九日, F. O. 1048/24/14。

⑥⑯ 南海县令潘公布广东巡抚朱桂桢、粤海关监督中祥告示, F. O. 1048/31/36。

⑥⑰ 两广总督卢坤等谕行商, 道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 F. O. 1048/33/15。

⑥⑱ 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朱桂桢、粤海关监督中祥示, 道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 F. O. 1048/33/16。

⑥⑲ 1833 年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朱桂桢、粤海关监督中祥等谕示多道, 见 F. O. 1048/33/22、28、29、30、31。

⑦⑩ 安徽茶商议定章程, 无日期, F. O. 1048/19/3。

⑦⑪ 茶商翥馨致咸臣等, 无日期, F. O. 1048/20/5。

作者简介: 吴义雄, 中山大学历史系暨广州口岸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 李振武]

commodity-capital relations are the objective form of things, and to reveal the basic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way to transcend modern history. Based on the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capital categor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abstract and concrete, subject and obj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modernity. With this revelation, an intrinsic inner link among capital logic, critique of modernity and historical dialectics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thus contribute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holeness of Marx's theory from the social-historical ontology.

#### **(4) A Meticulous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n Yat-sen and Liao Zhong-kai Before Sun Passed Away**

*Zhang Xiaohui*·92·

During the KMT-CPC Cooperation, Liao Zhong-kai's political views got closer to those of the Soviet consultants and the CPC, and thus irritated KMT's right wing faction and the Cantonese merchants. The Canton Merchant Volunteers Corps Uprising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n Yat-sen and Liao Zhong-kai. It provoked conflicts among the party, the government, the army and the society, and incurred much antagonism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se went contrary to Sun's basic theory of the "class conciliation." At the time when Liao was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and the governor of the Canton province, the fina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almost collapsed. Liao claimed his "hopelessness" and resigned from the important positions gradually. However, Sun still entrusted him with the party affairs. During the merchant uprising, Sun focused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the northern military campaign. He entrusted northern and later eastern expedition to Chiang Kai-shek, relied heavily on Wang Jingwei to handle general affairs at Beijing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assigned Hu Hanming as vice generalissimo (the most powerful figure) to preside over the Canton base. However, it was very unusual that Sun alienated Liao at this moment while working intimately with the other three.

#### **(5) Chinese Documents of the Canton Factory of the EIC and the Studies of the Sino-Western Relations in the Mid-Qing Period**

*Wu Yixiong*·112·

The Chinese Documents of the Canton Factory of the British East Indian Company (File Number: F. O. 1048) which consist of 1232 papers, are almost all produced from 1802 to 1835. A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those documents can be complementary with published materials such as *Qing dai wai jiao shi liao*, *Ya pian zhan zheng qian zhong ying jiao she wen shu*, and *Da zhong ji*, and can be mutually proved with the materials of English documents such as those in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n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by H. B. Morse. Furthermore, they will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no-Western relations in the mid-Qing period.

#### **(6) The Concept of "Great Literature" and the Thought of Academic History in Ancient Literature**

*Wang Li*·152·

Since the new century, corresponding to the voice of returning to the literary standard, the innovation in ancient literature manifests the tendency of returning to the conception of "great literature" such as